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守护国家宝藏，谱写古蜀华章

本报记者 杨亚鹏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女干部职工占比近70%，始终为当好古蜀文化的守夜者、中华文明的传薪人努力奋斗着。

她们中，有扎根田野的女考古队员，有妙手回春的女文物修复师，有传播历史文化的女讲解员，也有才华横溢的女策展人、女文创设计师……她们挥洒青春汗水，奉献智慧才华，是一支团结和谐、能打硬仗、奋勇争先的优秀团队。

三星堆遗址展现了独具特色、极具创造力的中国青铜文明，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在2019年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全面考古勘探与发掘现场，一朵朵“田野玫瑰”绽放三星堆，“她力量”撑起考古发掘半边天。利用最新科技和工作模式，历经近三年的连续奋战，三星堆考古发掘取得新一轮考古发现重大成就，基本厘清三星堆文化起源和发展脉络，出土文物1.7万余件，近完整器超过4800件，三星堆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三星堆博物馆始终坚守文化根脉，把“文化传播”融合在血脉里。在大家的努力下，“三星堆热”席卷全球，向全世界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广泛传播了中国声音。乘着这轮东风，三星堆趁势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提高三星堆文化影响力知名度。一方面，加大对馆藏精品文物视频及3D数据采集力度，利用AR、GPS、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打造现象级的三星堆文物、遗址数字化产品，用现代的方式解读展示古老的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开展全球文化推广重大活动，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华文化全球推广之“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考古纪录片《又见三星堆》获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三星堆最新



讲解员团队



文物修复团队

重要出土文物和创意舞蹈《金面》惊艳亮相央视春晚。

《国家宝藏（第三季）》《万里走单骑》《古蜀瑰宝》等节目，“艺绘三星堆”“我的三星堆世界”等系列主题传播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点赞。5大系列1000余种具有古蜀特色、“国潮”特色的文创产品，综合收入三年内增长3倍。积极创新推广模式，在成都方所书屋开设形象展示店，在天府机场开设“天府文创店”。这些有效举措，让三星堆这一IP持续成为热点。

不论是新一轮考古发掘的一件件珍贵文物，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一场场文化传播，都让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掀开了新的篇章，这些成绩的获得也都凝聚着巾帼女将们的心血与智慧，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着女性力量，以最美的芳华凝聚了属于“半边天”的巾帼力量。

三星堆博物馆始终把“活化利用”体现在成效中。积极融入环成都文旅经济带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有机串联金沙遗址、大熊猫基地等景区，推动璀璨的古蜀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以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为引领，在硬件和软件上“双管齐下”。筹措8亿元改扩建三星堆大道，投入1600万元实施博物馆至考古发掘现场沿线生态环境整治。全面提升票务系统，实现多渠道购票多形式入馆，增设移动厕所、

游客休息区，让游客到三星堆既能“快旅”又能“慢游”，既“开眼”又“舒心”。同时，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上做文章，举办三星堆“新年大典”、三星堆“半马”比赛等特色活动，开展“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三星堆博物馆之夜”等主题活动，成为全国热门“打卡地”。

节假日期间，三星堆的女干部职工全员上岗，做好咨询引导、秩序维护、馆区巡逻等接待工作，三星堆“她力量”将转心揖志的情融入工作的点点滴滴中，以规范高效的管理、热忱用心的服务，为游客创造了良好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三星堆“巾帼力量”参与的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修复、陈列展览、文创产业、社会教育、宣传推广等各项工作，被中央主流媒体报道百余次。

因为热爱，巾帼女将们在文博事业中用她们对艺术、色彩的敏感，用她们的细腻坚韧，在三星堆中将一件件破旧的青铜器、石器、玉器恢复往日神韵；抑或站在馆内，为无数游客绘声绘色讲述着千年古蜀文明；或是致力于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和智慧博物馆建设。

她们表示，将以党的召唤和三星堆文博事业的需要为坐标，以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和毅力，着力发掘好、保护好、研究好三星堆遗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女考古学家群扫描

高大伦

近几年考古很热，而且越来越热。考古报道也从以前的以发现为主，逐渐向透物见人转变。这里透物所见的人，既有与透物遗迹相关的历史人物，也包括考古学家们。通过媒体的报道，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渐渐为世人所了解。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思维定式的限制，因长年野外作业，体力活既重又多，在许多人看来，考古是个辛苦职业，考古人很难家庭和事业兼顾，因而认为女性报考志愿并不适合选择报考考古专业。这其实有很大的误会，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不过100年，从诞生早期起，就有勇敢的女性大胆选择考古专业，毕业后也执着地投身考古事业。如四川彭山江口沉银岸边的江口崖墓，1940年代初发掘，留英归国的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就是主要参与者。当然，在那个年代，曾昭燏这样的女考古学家几乎可以说是孤例。

1949年以后，全国人民大翻身，妇女大解放，各行各业都开始有妇女身影。1950年代初期，文化部和北京大学办的多期全国考古领队培训班中就有女学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女考古专业招收了六十名女生，郑振香、刘一曼、糕振西、李毓芳、樊锦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郑振香发掘了殷墟唯一没被盗的大贵族墓——大名鼎鼎的妇好墓；刘一曼是1950年后考古发现最多的商代甲骨文——小屯南地甲骨发掘的主持人；糕振西是考古史上第一个唐末金窑发掘的主持人；李毓芳长期主持秦汉都城遗址特别是秦“阿房宫”的发掘及重新论证；有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坚守大漠几十年，和敦煌齐名，并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殊荣。

以上属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选择考古作为职业的女考古学家们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在那个年代，女性在考古队伍中占比不高，有成就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家知道，1980年以前我国的考古工作，无论是野外发掘或是室内整理条件都很差，社会上许多人说起考古队，就立即联想到地质队。业内外的共识是：干考古需要特别能吃苦耐劳而且还耐得住寂寞。因此女性考古的并不多，毕业后继续从事考古的少，执着坚持并作为终身职业的更少。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高考的恢复，经济的起飞，考古事业的壮大，不断有一些主动勇敢选择考古的女青年，也不断有大批高考志愿选择范围有限，“被服从分配”误打误撞的女性闯进了考古学，并在毕业后分配到考古院所工作。经过多年的打拼，在一般人看来是男性天下的考古行业打下一片天地，在社会上有了强烈的

存在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女考古学家，是一个群体，并非少数五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们的共同特点是：

立足田野。她们都很清醒地认识到考古之所以发展成为独立于历史的一门学科，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田野考古。考古学家工作就是从田野出发，从田野发掘获得研究课题和标本，又从田野得到实证。她们明白选择考古就是选择工作从田野到田野的循环，明知田野考古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也持之以恒，义无反顾。

思想活跃。近年来，无论在重大学术课题申报、学术热点讨论，还是公众考古的公益活动，考古女队员们都没缺席。

涉猎广泛。除传统考古学研究做得很出色外，她们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体质人类学、科学测年、环境考古、古人类DNA检测、东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甚至是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发掘也不让须眉。

视野开阔。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年轻女性抓住机会赴海外留学，考古人出国深造渐成潮流。已有部分女考古学家较早融入并活跃在国际考古舞台。她们出国并非为了镀金，而是瞄准国际考古新方法新技术奋力追赶，用学到的新方法新技术大大推动国内考古学发展。

吃苦耐劳。考古学是一门既考智力也拼体力的专业学科。无论条件怎样改善，在当今时代，它仍是工作条件艰苦、劳动报酬缺乏吸引力的行业。女性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意味着个人和家庭有更多的牺牲。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于春带着不足半岁的双胞胎婴儿去石窟调查，前一小时从测架上来下来给大双喂奶，后一小时再下来为小双喂奶。曾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讲过因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室外斗转星移的日子都快记不清了。也听河北师范大学青年考古教师施兰英详细描述过行走在靠近巴阿边境白沙瓦地区的经历。也经历过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万娇带领几个女孩从茂县翻越4000米高的九顶山到达成都平原考察，一个星期以上无音讯的焦虑。

成果丰硕。这批女考古学家非但田野发掘不输男同行，科研成果也十分突出。近年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会上，总能见到她们大方自信地走到报告席前侃侃而谈，她们在国际顶流学术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引得国内同行艳羡，她们的专题报告发表速度和数量质量都令大家刮

目相看。部分人因功底扎实，转身又成为著名考古博物馆策展人。

独当一面。以上女考古学家中有人成长为省级考院所所长、副所长，在她们带领或辅佐下的所在院所，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20世纪80年代，各大学考古专业每年招进新生中，女生占比很小，有的高校个别年份甚至全班都没有女生。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男女生失衡的状况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在十多年前，大学老师们就聊到现在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多起来了，男生女生基本各占一半，硕士、博士生女多于男，这种现象如今已是常态。例如，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文博本科专业本科2022、2023两届学生，每届招生上百人，其中女生占比达到80%。这几年地方考院所招聘新人时，报名者中女生为绝对主力，这些令大学老师和考院所所长们感慨不已。私下聊天中，能强烈感受到个别老师和院所所长还存在一些担心、畏难和抵触情绪。了解我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女考古学家们的成长史，就知道这种担心、畏难和抵触，其实大可不必，几十年来国内女考古学家们通过努力取得的成绩，为女性在考古行业打下了一片天地。放眼世界，女部长、女国防部长、女总理、女司令、女总统早已不罕见。相比之下，对女性而言，考古行业又何来特殊？就全球范围而言，女考古学家早已不是稀缺品。当今，正在地中海亚利山大港找寻埃及艳后陵墓的一线考古负责人是尼加拉瓜的女考古学家，在同一座城里苦苦找寻亚历山大帝陵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希腊的女考古学家，尤其是后者发掘的对象，被世界考古学界视为迄今为止最为重要、最值得期待的且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

众多女考古工作者已用自身行动、经历、成果实证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相比男性，女性体力较弱，还要承担更多家庭事务。对于孩子尚幼小的女考古队员，是否可以帮助她们在考古发掘当地联系托儿所、幼儿园。

随着中央到地方对考古事业的重视，各地各级考古机构也在迅速大规模扩编；从目前高校考古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的性别比例和报考趋势来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各考院所及考古博物馆里业务人员，女性占比会更高，数量上超过男性是大概率。回顾国内外考古事业发展，我们有理由看好中国女考古学家群，充分相信她们还会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为世界带来更多、更大、更激动人心的考古新发现。

（作者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全国三八红旗手宋淑霞：

敦煌人，敦煌情

甘婷婷

“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1998年2月25日。”这是宋淑霞第一天到敦煌研究院的日子，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了她长达26年的敦煌文化宣教工作。

今年3月3日，全国妇联在京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宋淑霞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从初出校园的学生到如今成长为专家型讲解员，宋淑霞始终坚守在敦煌文化弘扬事业的第一线，长期从事敦煌文化弘扬、讲解员培训、社会公众教育等工作，参与并圆满完成多项重大讲解接待工作。她满怀感情和热爱，成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之一，也见证了敦煌的传承与发展。

全世界大城市很多，莫高窟只有一个

“早上出发，到敦煌已经晚上6点多”，一栋简朴的二层小楼，水泥石板、木板、一张桌子、两个暖水瓶，这是宋淑霞初到敦煌见到的宿舍。“这里也是研究院专家们住的地方。那天一同来报到的有13人，其中1名男生和家人一起来的，下了车连行李都没放就走了。”宋淑霞是甘肃酒泉人，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做讲解员，“那天天锦诗院长特意在食堂为我们接风”，宋淑霞没多想便留了下来，“这一留，没想留了一辈子。”

宋淑霞刚入职时部门叫“接待部”，主要任务是游客做好讲解服务。“一讲就是一天，同事互相帮忙带午饭，忙起来顾不上，饭也早凉了。”处在戈壁大漠中的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有20多公里，那时没有电话，没有小卖部，甚至没有洗澡的地方。当时，她和同事们最期待的就是每周一次的进城，“可以去市里痛快洗个澡，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女孩子们一起逛逛街，买点日常用品……”说到这里，宋淑霞依然带着当初的兴奋。

工作一年后，得知陕西卫视招考主持人，“我去了，抱着对大城市、电视台的向往，去了西安。”不出意外，宋淑霞成功通过面试。回到敦煌，宋淑霞准备辞职时，当时的石窟管理科

科长对宋淑霞说：“你要离开了，有点遗憾，毕竟在这里工作一场，留个纪念吧，我带你到窟边照几张工作照。”走到熟悉的石窟前，在敦煌生活的种种翻涌而来，她犹豫了。“情感留人，忽然就不想走了。无论是樊院长，还是院里的其他专家，都把我们当孩子一样，不仅在工作中传帮带，生活中也跟我们聊家常，对我们嘘寒问暖。这里的老师们都特别可爱，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很温暖。”宋淑霞有些动情地回忆道，“人文环境特别好，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氛围，全世界大城市有很多，但莫高窟只有一个”。这样的情感，让她已离不开敦煌，离不开莫高窟了。之后多次其他的工作机会，她和她的家庭毅然选择留在敦煌。

探索创新，让敦煌文化走出去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迫切增长，敦煌研究院的宣教任务随之不断扩展探索创新，原来的“接待部”更名为“文化弘扬部”。2014年起，部门对讲解员的培训和要求也一改以往，从制式说辞改为“个性化定制”，鼓励讲解员自主学习，自我发挥。“充分调动讲解员们自身潜能，这样的讲解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不仅讲解更生动了，也很锻炼人。”宋淑霞说。

讲解工作也不再限于遗址地，这几年宋淑霞和同事们很忙。自2017年来，宋淑霞带领优秀讲解员率先在敦煌市中小学开展“我是莫高窟小小讲解员”社教活动，至今已培训选拔出200余名“小小讲解员”。“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更是希望把敦煌文化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的心里，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让文化自信由内而



生。”宋淑霞说道。2022年，文化弘扬部与敦煌市七所学校对接开展品牌社会教育项目“莫高学堂”，通过有趣的课程，把敦煌文化融入素质教育；参与策划了《出发啦！敦煌》《“画”中有话 敦煌石窟百讲》等线上音频课程，带领公众更全面地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同时，参与文化传播方式创新，探索运用科技力量推出了飞天游览专线。

活到老学到老，敦煌人的孜孜以求

在莫高窟的二十多年里，宋淑霞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老一辈莫高窟人会放弃优越条件，选择留在敦煌坚守一辈子。“太美了，看不够，讲不够。”1998年到现在，宋淑霞几乎没有过节，始终潜心学习，积累自己的涵养学识，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多次在讲解大赛中获奖，也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独立编撰《敦煌与丝绸之路》一书，参与策划出版了《“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普及读物和《云赏敦煌》短视频，把专业知识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公众。

这些年宋淑霞先后获得“世博青年服务之星”、甘肃省直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谈及未来，她说：“樊院长曾讲，‘讲解员的素质，决定文化遗产的阐释’，接下来还将多花心思和精力做好讲解员队伍建设，探索更有趣、更贴近大众、更有参与感和体验感的文化弘扬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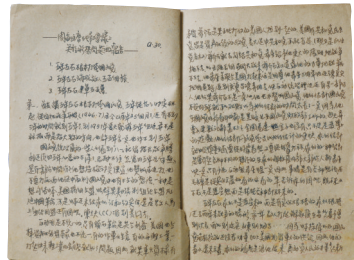
文物再现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盛会

梁少波 高星

1948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会，也是解放区与国统区妇女组织和妇女代表的一次大会师。从此，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中国妇女自身的解放与进步迈出新的步伐。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记录本

西柏坡纪念馆收藏有一本记载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的记录本，它长17厘米，宽13厘米，左侧两个锈迹斑斑的书记将9页发黄的纸订在一起，蓝色钢笔书写的字迹却依旧清晰——“1948年9月在妇女会上关于形势报告的记录——清波于中央妇委妇工会记”。记录本的主人叫田清波，1924年11月生于河北省宁晋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妇女工作也要面向城市。因此，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并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华中、西北、山东、华南等解放区的妇女干部85人，还有中央直属机关的80多名干部列席。当时，田清波在冀南区四地委担任调研科副科长，她被组织选派到西柏坡参加妇女工作会议。

会上，邓颖超同志作了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杨之华就婚姻问题、李培之就妇女干部问题、康克清就儿童保育工作、罗琼就妇女参加生产问题作了专

题发言。代表们根据大会报告，结合各地妇女运动情况和经验展开了热烈讨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田清波珍藏的这份会议记录，就是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她回忆说：“周总理在题为五年左右打败蒋介石，五年左右建军500万的讲话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并提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和任务，非常鼓舞人心。周总理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因是第一次聆听总理讲话，我听得特别认真，记录做得特别仔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都快被我记完了。”

会议期间，邓颖超得知田清波曾在宁南县担任妇救会主任，妇女工作搞得很有特色，多次受到区党委和地委的表扬，便专门派她的秘书陈楚平找到田清波，请她介绍宁南县妇女运动的情况。田清波带着惊喜的心情，详细汇报了在宁南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分享胜利果实、翻身解放，以及组织妇女自卫队、识字班的过程。陈楚平将田清波介绍的情况向邓颖超汇报后，邓颖超充分肯定了宁南县的妇女运动，使田清波受到很大鼓舞。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献》



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本《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献》。封面印有“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献”，下方印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部编”“新华书店发行”，扉页印有书名、编者和出版者“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行者“新华书店”，时间“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其汇编了为庆祝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的党中央贺电和题词、会议讲话及决议附录。

1948年秋天，在西柏坡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就全力以赴开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12日，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西柏坡成立。选出蔡畅为主任，邓颖超、李德全为副主任，张琴秋为秘书长，孙文淑、曾宪植为副秘书长。

为了使各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筹备会编写了《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中国解放区农村翻身运动素描》《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生产运动》《中国解放区妇女参战运动》《新社会的新女工》《中国解放区的儿童生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国际民主妇女运动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运动》《中国解放区的南丁格尔们》等《妇女丛书》10册。

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的妇女代表共计467人。她们中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过英勇斗争的女工汤桂芬和解放区的模範女工，有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其他女英雄，有经过长征的女干部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女战士，有宗教界代表，华侨界代表和各民主党派的妇女，还有少数民族的妇女代表，有经历过中国革命严峻考验的革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妇女工作者。她们胸前佩戴着代表意义的风发地走进会场，喜气洋洋地参加标志着中国二亿五千万妇女翻身解放的盛会。

大会从1949年3月24日开幕至4月3日闭幕，历时11天，会议议程紧凑，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组织代表们筹备次日会议或观看晚会、评剧。为了方便沟通，会务组将四百多名代表分成小组。经充分讨论后，蔡畅、邓颖超、李德全、刘亚雄、刘贵珍、张金保、房明理、赵金子、王秀琴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40余位代表分别发言。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妇女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国妇女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